
论《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地位与作用

徐光寿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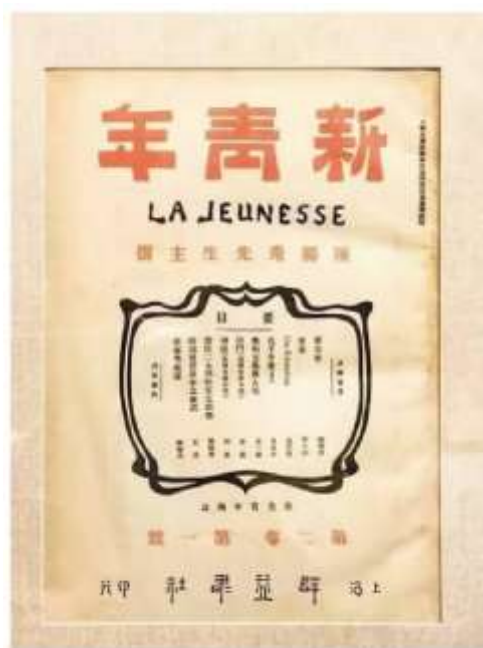
在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新青年》的作用是全面而又持久的。举凡思想、文化、文学、教育等方面,没有任何一本刊物的影响力堪与《新青年》相比。凡当时追求进步之青年,无不视《新青年》为旗帜,以《新青年》为明灯。蔡元培曾说:“《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一个杂志开启了一段历史,掀起了一场划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青年》是我国最早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期刊。《新青年》月刊从 1915 年 9 月创刊,至 1922 年 7 月停刊。其出版发行期间,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成立的历史时期。这本 20 世纪中国极具影响力的名刊,它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由它推动而暴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则为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新青年》杂志存在全面的直接的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大多出自《新青年》作者群,早期的中共党员大多来自《新青年》读者群,《新青年》编辑部成了党的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杂志也变成了党的理论刊物。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大多来自《新青年》作者群

《新青年》的作者群不仅包括其作者队伍,也包括编辑队伍,因为《新青年》的作者、编辑队伍历来都是身兼二任、融为一体的。作为《新青年》作者群的标志性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即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不仅是《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也是最主要的作者。他早年从封建士子转变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后,思想上经历了三次重要跨越,至五四以后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在《新青年》这出大剧中,陈独秀集编剧、导演和演员于一身,总是根据剧目的要求不断寻找演员、选择演员、更换演员。与《新青年》这种长久、深厚的关系,“使他在各个阶段,都扮演了他人不能替代的重要角色。陈独秀的个人意志对《新青年》办刊理念的演变和取向起有关键性作用,这一点在从同人刊物转变为中共机关刊物时尤为明显,过去人们对此似估计不足。”(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之历史考察——以 1920-1921 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J]. 2009 年第 3 期,第 102-103 页。)

作为向来主张直接行动、敢作敢当且富有牺牲精神的陈独秀,他的一生经爱国而革命,每个历史阶段大致都经历了办报刊-办学校-建政党的实践路径,即从办报刊开局,建政党结局。辛亥革命前,他就经历过从办报刊(《安徽俗话报》)、办学校(安徽公学)到建政党(革命团体岳王会),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从办报刊(创办《新青年》)开局,经过办学校(北京大学和筹备中的西南大学),到创建中国共产党,继续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陈独秀独辟蹊径,是我国近代历史迂回发展在陈独秀身上的体现。”(沈寂:《陈独秀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6 页。)



陈独秀由创办并主编《新青年》而创建中国共产党，其价值和作用不仅得到指导和帮助中共创建的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和苏俄政府的高度评价和特别认同，也得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首位来华的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在 1920 年 6 月首次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就称赞陈独秀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这是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并亲临《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通宵长谈建党事宜。另一位长期在华从事地下工作的俄共（布）党员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 1921 年 4 月 21 日在写给俄共（布）领导人的绝密报告中说：“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 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8、30、59 页。）对陈独秀的建党工作和《新青年》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2019 年 10 月，中共党史权威期刊发表长篇论文，该文“编者按”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年是陈独秀诞辰 140 周年，我们发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撰写的《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一文，以志纪念。”文章尊称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这些评价也是对《新青年》历史地位的充分认可。

李大钊既是《新青年》的作者，也是《新青年》的北京同人。他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论文，都是在《新青年》发表的。他在《新青年》首次发表的《青年与老人》一文，倡导青年与老年“协力”“调和”，以共同“负此再造国家民族之责任”。意在激发青年一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

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观察、比较，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两个演讲并在《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发表。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 20 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洞察到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及以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他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5、6 号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史的奠基之作。在《新青年》第 7 卷 2 号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是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缓慢原因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在第 7 卷 6 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五一（MayDay）运动史》，则全面梳理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产生和由来。而 1920 年 12 月 1 日在《新青年》第 8 卷 4 号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

论做了全面的阐释。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率先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了向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方向发展。同年10月，他积极响应陈独秀上海建党，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至此，李大钊完成了从思想宣传到实践建党的重要升华。他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紧跟时代潮流，当之无愧地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先驱。

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巨大贡献与影响，他们赢得了进步知识界的尊崇，被誉为“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种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了一大批有志青年迅速走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就是在陈独秀、李大钊影响下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

二、早期中共党员大多来自《新青年》读者群

《新青年》创刊尤其是迁至北大后，迅速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逐步形成了一个《新青年》读者群，进而形成一个特有的新青年群体。他们对于五四运动的暴发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发挥了主体性作用。其中又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为主要代表。这个群体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曾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新青年》也是青年毛泽东投身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导师。延安时期他曾不止一次深情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当1920年5月拜访《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进行彻夜长谈，16年后毛泽东回忆道：“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坚定地认为到1920年夏，在理论和这样程度的行动上，他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也是受到《新青年》的启发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在他1918年到日本留学前后，曾读到过《新青年》，并深受其中所写的内容和所宣传的思想的感染，促使其思想觉悟大提升。192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

此外，受到《新青年》教育走上革命道路的，不仅是一代青年，还包括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吴玉章、林伯渠和董必武都是从老同盟会员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代表。吴玉章曾说，我找了将近三十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一批老革命家也以《新青年》作为启蒙课本。李一氓回忆自己早年“先后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大同中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在这期间，他花了很多时间研读《新青年》《向导》《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等书刊，首先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他在上海和苏州求学期间参加反帝爱国的进步学生运动，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彭德怀早年也曾受到《新青年》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的思想引领。1926年彭德怀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宋时轮1923年进入军阀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学习，“与左权、蔡申熙等同学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开始阅读《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刊，逐步萌生了共产主义思想。”此后宋时轮思想进步很快，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

不仅如此，《新青年》对其他进步青年的影响也很大。《新青年》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当时全国青年几乎把编辑《新青年》的几位先生当做“圣哲”来崇拜。《新青年》出版到第2卷时，就有读者来信抒发读后感，这正是陈独秀所期盼的。对于读者来信，他有问必答，并作选择性刊登。浙江青年毕云程读了《新青年》第1卷，即给陈独秀写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与陈独秀通信最多的青年读者之一，读后自称“如获至宝”“语语深入我心，神经感奋”“诚我青年界之明星。”在《新青年》鼓励下，毕云程积极团结进步青年，组织学习活动，探索救国道理，传播民主思想。

1916年，正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攻读军事知识的青年叶挺给《新青年》写了一封长信，抒发了阅读《新青年》的感想，提出了拯救社会的主张，表达了“振污世，起衰溺”的革命理想和对《新青年》的感激之情。陈独秀以《新青年》记者名义给予了热情肯定和客观指正，令叶挺十分感动。1919年叶挺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即投身革命，并参加援闽粤军后加入国民党。1922年1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此外，著名翻译家、国务院原参事、觉悟社成员谌小岑回忆第一次学习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的理论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说：“当我第一次读了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受到很大启发，就同黄正清谈论，在中国的阶级对立，主要是少数外国鬼子和中国工人的对立。”

因此，史学家丁守和指出：“《新青年》作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要宣传阵地，在中国发生了巨大影响，它唤醒了广大知识青年，使他们投身到革命的洪流，它培养了整整一代革命家。”新青年社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摇篮。纵观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及早期著名活动家，几乎都与《新青年》杂志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中与《新青年》有直接联系（依是否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文章）的就有毛泽东、恽代英、张申府、李达、李汉俊、袁振英、李季、杨明斋、陈望道、沈雁冰、沈玄庐、施存统、沈泽民等人。以新青年社为依托，以“南陈北李”为核心逐渐形成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正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骨干力量和组织基础。

三、党的发起组成立地就在《新青年》编辑部

《新青年》月刊自创刊之时起，始终在上海、北京之间迁徙。《青年杂志》创刊伊始，编辑部设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吉甯里21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楼房里，楼上住家，楼下就是编辑部，极其简陋。第2卷易名《新青年》后，编辑部仍设这里。

1917年1月陈独秀应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同年3月迁往北京。虽然北大设有专门的文科学长办公室，但为与北大区别开来，陈独秀继续将《新青年》编辑部设在自己寓所，即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20号（旧门牌9号）。于是，北京大学与《新青年》就形成了“一校一刊”的新文化格局，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1920年2月，陈独秀为防范再遭北洋政府逮捕，在李大钊的护送下从北京来到天津，从天津坐轮船到达上海。同年3月，陈独秀入住上海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即迁入。从1920年4月1日第7卷4号起，至1922年6月《新青年》月刊实际上均在此出刊，至9卷6号停办，中间偶有延期，共出刊15号（期）。这两年零四个月恰好经历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全部历史过程，《新青年》编辑部荣幸地成了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地和党的一大的筹备处。

（一）《新青年》编辑部聚集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

关于老渔阳里2号的功能，楼上两间是陈独秀、高君曼夫妇及两个未成年孩子陈子美、陈鹤年的卧室，楼下右侧一间是陈独秀的会客室，左侧一间堂屋是随着陈独秀迁来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同时也是“负责《新青年》编辑部事”“办理编辑事务”陈望道的临时住所。1920年8月15日创刊的《劳动界》杂志，编辑部也设在这间。而面积较小的亭子间，从1920年11月7日起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及其主编李达的临时住所。

根据陈独秀的安排，除陈望道、李达入住老渔阳里2号，应邀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的还有李汉俊、沈雁冰、袁振英和叶天底等人。李汉俊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原为《星期评论》编辑，曾校对《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停刊后应邀加盟《新青年》编辑部。沈雁冰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思想进步，有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袁振英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专业，受陈独秀安排负责《新青年》第8卷1号起开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

（二）出入陈独秀寓所和《新青年》编辑部的早期共产党人更多

据不完全统计，在1920年4月至1922年6月《新青年》编辑部运转期间，出入老渔阳里2号的早期共产党人有51位之多。

除前文所述的几位外，还主要有张申府、俞秀松、施存统、李中、毛泽东、包惠僧、林伯渠、王会悟等人。

张申府是陈独秀的北大同事，与李大钊、陈独秀共同创办《每周评论》，负责编辑事务，同时也担任《新青年》编辑，堪称志同道合。1920年9月，张申府来上海迎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就住在《新青年》编辑部。双方谈论建党一事，一致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同年9月下旬，张申府回到北京，向李大钊转告了陈独秀要他们建党的意见。俞秀松、施存统也较早出入这里。1920年3月俞秀松、施存统从北京转来上海，进入《星期评论》社工作。俞秀松领导杭州五四运动，施存统因发表《非孝》一文，两人都引起了《新青年》陈独秀的关注，此次来沪就被留在上海，在陈独秀等人安排下一边进工厂做工，一边协助筹备建党。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李中的陪同下，他曾多次拜访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畅谈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问题。陈独秀委托毛泽东回湖南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送给他《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三本书，还向亚东图书馆担保300大洋让毛泽东带回湖南开展新民学会并建立党团。此次长谈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很大，在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林伯渠1920年12月间也曾光顾老渔阳里2号，他后来回忆：“我在日本时认识了李大钊，和他很熟，我回国后，和他通信。1920年12月我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三）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地和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在《新青年》编辑部

由于史料的缺失，虽然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日期难以确定，但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则毫无疑义。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党的一大筹备工作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记载，1920年6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寓所召集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会议明确建立“社会共产党”（简称“社会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同年8月，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正式定名为“共产党”，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正式成立。这个地点也得到了解密档案资料的证实。据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的信，7月19日晚，被称为“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在《新青年》编辑部召开，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出席会议，会上不仅坚决主张建立“上海革命局”，而且决定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社会主义小丛书。可见，1920年8月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被俄罗斯解密档案中所记载，应是确切无疑的事实。

党的一大筹备工作也在这里完成。党的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主要工作地点在《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南下广州后，作为代理书记的李汉俊，其工作地点主要在《新青年》编辑部。接替李汉俊任代理书记的李达，就临时居住在《新青年》编辑部。1921年6月初，马林、尼克尔斯基来华推动召开党的一大，也是在《新青年》编辑部通过李达给各地党组织写信通知的。各地代表来沪开会，首先也是赶到《新青年》编辑部报到后再被安排到博文女校住宿的。甚至1921年7月30日晚一大会场突遭破坏、代表们临时商量转移开会地点的场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因为这里就是代表们心中的筹备处。

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始终是最主要的阵地和最重要的象征。《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尤其是上海建党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思想引领、培育骨干、组建队伍、推动建党的特殊作用，不愧“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而且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新青年》杂志又成了党的理论刊物，继续为建党伟业和党建事业发挥了举旗定向的作用。